

刘伯承 与邓小平

田酉如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刘伯承与邓小平

转战太行

田酉如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北京·

(京) 新登字 10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刘伯承与邓小平：转战太行/田酉如著.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 7

ISBN 7-5035-1048-X

I . 刘… II . 田… III . ①纪实文学-中国-现代②刘
伯承-生平事迹③邓小平-生平事迹 IV .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 03992 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民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1994 年 8 月第 1 版 199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9

字数：233 千字 印数：1-8000 册

定价：7.80 元

我们一起工作，是1938年在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个师长，一个政治委员。

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

——邓小平：《悼伯承》

FJH/56

• 目 录 •

序	战友情深	(1)
第一章	危难之际	(5)
一	毛泽东提出“围棋”战策，要在华北敌后用 “做眼”的方式，发展自己，吃掉敌方	(5)
二	为了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刘伯承率先脱下红 星帽，换上国民党军的青天白日帽	(10)
三	周恩来到山西后，第四次点邓小平的将，把在 敌后发展抗日力量的重任交给邓小平	(17)
四	邓小平接受重托，以其雄才大略，很快在敌后 打开了局面，在晋东北、晋西地区扎下了根	(23)
五	面对我弱敌强的态势，刘伯承反用“兵无常 势”原则取胜，令卫立煌夸赞不已	(29)
第二章	雄踞太行	(37)
一	在石拐会议上，刘伯承提出在太行山上分而散 之的布阵蓝图，把毛泽东的围棋战略具体化	(37)
二	刘伯承、徐向前把游击种子撒向太行山中，使 八路军的根基深深地扎在人民群众之中	(45)
三	从天而降的王明，给敌后大刀阔斧地展开工作 蒙上了阴影。邓小平、彭真坚持独立自主的原 则，当仁不让开展工作	(53)
四	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联手指挥的反九路围 攻战，奠定了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基础	(60)

- 五 刘伯承、邓小平和省委一起，大刀阔斧地建立军区、发展党组织，造成了雄踞太行的局势…… (73)

第三章 东打西杀…………… (81)

- 一 徐向前在冀南平原把广大人民造成人山，建立起根据地；刘伯承、邓小平挥戈东进打击敌人，保护了人山，巩固了根据地…………… (81)
- 二 面对日军的进攻、顽军的捣乱，刘伯承、邓小平果敢地拒虎打狼，领导了抗日反顽斗争…………… (92)
- 三 黎城会议使根据地建设走上正规，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白晋战役，拉开了打击日军“囚笼政策”的序幕…………… (107)
- 四 在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中，刘伯承、邓小平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民众的配合下，取得了辉煌战果…………… (114)

第四章 扭转困局…………… (123)

- 一 敌人的烧杀抢掠、反共顽固派的破坏捣乱，使根据地在严重的自然灾害侵袭下，更为困难…………… (123)
- 二 刘伯承、邓小平从抓地方武装建设、建立边区政府两件大事入手，奠定了转变根据地困难局面的基础…………… (128)
- 三 困难中，刘伯承、邓小平抓精简，抓文化，减轻了群众负担，活跃了根据地文化生活…………… (136)
- 四 邓小平到敌情严重的太岳、中条区检查视察，指导反击敌顽进攻，巩固太岳，开辟中条…………… (143)
- 五 刘伯承巧与敌人周旋，在极为危险的情况下，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粉碎了5月大扫荡…………… (155)
- 六 困难中，邓小平出任太行分局书记；根据地，为

刘伯承庆祝 50 寿辰	(169)
第五章 走向胜利.....	(178)
一 邓小平主持温村会议，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制定夺取抗战胜利的方针政策	(178)
二 邓小平领导太行分局整风学习，强调从实际出发，解剖自己的思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182)
三 刘伯承、邓小平领导军民进行经济建设，使根据地的社会性质从根本上转变为新民主主义	(193)
四 植根于群众之中的人民军队，成功地粉碎了日军的进攻，歼灭了伪军主力，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	(202)
五 邓小平用太行材料回答毛泽东提出的 10 个问题，到冀鲁豫对群众运动进行调查研究	(207)
第六章 针锋相对.....	(224)
一 刘伯承、邓小平在上党盆地同阎、蒋军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保卫了抗战胜利果实，配合了重庆谈判	(224)
二 刘邓大军挥师向东，展开邯郸之战，阻止了国民党军向华北挺进的企图	(233)
三 为应付全面内战的爆发，刘伯承、邓小平一面积极备战，一面领导解放区加紧建设	(241)
四 面对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刘伯承、邓小平沉着应战，连连取胜	(248)
五 刘伯承、邓小平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挫败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从被动转入主动	(257)
六 刘伯承、邓小平指挥豫北反攻后，率领大军渡河南征，由内线打到外线，拉开了战略进攻的	

序幕	(265)
附：本书主要参考资料	(274)
后记	(278)

• 序 •

战 友 情 深

1986年10月9日晚，亿万人民坐在电视机前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时，一曲低沉的哀乐，把人们的神经一下子调动得紧张起来。哀乐声中，播音员缓慢悲痛地宣读着讣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人民的伟大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刘伯承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86年10月7日17时4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消息传开，人们为共和国失去一位功高德重、深受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由衷爱戴和尊敬的开国元勋而无限哀痛。

10月14日上午，位于北京市万寿路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礼堂内，刘伯承的遗体、安详地仰卧在鲜花和翠柏丛中。向遗体告别开始后，第一个走向遗体的，是50年前被人们广为传颂的太行山上的双雄“刘邓”中的邓小平。在邓小平的身后，他的夫人卓琳及全家成员，缓缓迈着沉重的步伐，一起向受他们敬仰爱戴的刘伯承元帅最后告别。

此时的邓小平，这位站在时代前列，以磅礴的气势，为社会主义的中国设计了一幅恢宏壮观的改革开放蓝图的总设计师，正肩负着领导东方雄狮进行一场人类历史上惊天动地的社会主义体

制的大改革。中国的改革进入 1986 年后，其经济正处在加速发展的飞跃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

在邓小平一生中，和刘伯承在太行山上 10 年共事的岁月，是他最为珍惜、思想走向成熟丰富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今天，在他又一次大展宏图的时候，不幸失去了当年最好的合作者，最亲密的老战友，因而特别悲痛。

得到刘伯承离世的消息后，邓小平思绪万千。虽然繁忙、紧张的政务、重大的国内、国际问题需要他思考、决策，但他仍以深厚的战友情谊，写下了《悼伯承》。1986 年 10 月 21 日，《人民日报》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这篇情深意笃的杰作：

伯承久病，终于不治。我和他长期共事，相知甚深。
他的辞世，使我至为悲痛。

.....

我认识伯承，是 1931 年在中央苏区。初次见面，他就给我留下忠厚、诚挚、和蔼的深刻印象。

邓小平和刘伯承同是四川人。当 1904 年 8 月 22 日邓小平在四川东部的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落地时，与他相距 2 百余公里的开县赵家场张家坝出生的刘伯承已经长成堂堂的大男孩，进入了高等小学读书，比邓小平早出生了 12 年。

邓小平 16 岁参加革命，是在远离中国的法国。这时，刘伯承已投入到军旅中，并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护国护法战争中以英勇善战、足智多谋名震全川，被誉为“川中名将”。

邓小平虽然年龄小于刘伯承，但他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的时间却早于刘伯承。1922 年，他在法国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4 年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刘伯承在同一年接触了共产党人，经过两年认真的观察和思考后，到 1926 年认识到只有走共产党的道路才能救中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邓小平和刘伯承都是留学苏联的职业革命家。邓小平大革命失败前就学于莫斯科东方大学，后转入中山大学，在大革命将要失败的前夕，回到国内。大革命失败后，在挽救党和革命命运的八七会议上，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秘书，列席了会议，会后不久，23岁的邓小平跃升为中央秘书长。刘伯承则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参加领导南昌起义这一缔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后，被派往苏联，进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后升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在苏期间，刘伯承参加了中共六大，并在会上作了《军事问题补充报告》。1930年夏学成回国后，刘伯承回上海中央，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长江局军委书记，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刘伯承到中央工作时，邓小平已于一年前被派往广西，创建红七军、红八军，开辟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这样，两位四川老乡未能在上海中央见面。在苏联学文的邓小平，回国以后适逢中共正在抓建立革命武装的时机，使他走上了进入军旅生活的道路，这以后和大军事战略家刘伯承合作，提供了一个客观的条件。留苏和创建红军这两个经历，是刘、邓在太行山上能够密切合作的客观条件和基础。

然而，更为重要的条件和基础，是两人共有的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和胸怀坦荡、光明磊落、百折不挠的品格。

1931年他们初次认识时，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刘伯承到中央苏区后，被毛泽东、朱德委以重任，担任了为党培养输送军政人才的红军学校的校长兼政委（不久改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后又出任了中央军委总参谋长。邓小平则是因在广西抵制“左”倾错误，被中央召回上海汇报工作后，转到中央苏区的。“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共中央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对一直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的邓小平进行批判。邓小平从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职位上，毫不妥协地坚持与“左”倾错误斗争，直至被撤销职务，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当

了一名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巡视员。在这时，邓小平对闻名军中的刘伯承非常景仰，有机会见到了这位总参谋长。

就在邓小平受到错误处分后不久，刘伯承因反对位居中央军事顾问的共产国际代表李德的军事指挥上的教条主义，受到撤销总参谋长职务的处分。邓小平很赞赏刘伯承的勇气和胆略。

遵义会议是邓小平和刘伯承共同参加的第一个关系党和军队前途命运的会议。会前，邓小平第二次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刘伯承第二次出任总参谋长。相似的遭遇，相近的品格情操，使邓小平和刘伯承的距离超越年龄的差异，逐步贴近了。遵义会议的参加者中，四川籍的有朱德、刘伯承、聂荣臻、邓小平、杨尚昆等人。会上，毛泽东曾戏言，真正革命者的食粮是红辣椒，谁不能吃红辣椒，谁就不能战斗。这话虽是无意的谑语，但参加会的5位四川人，不仅吃辣椒的能力大，而且坚持正确意见的决心大，为使会议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刘伯承与彝族部落首领“歃血为盟”，在大渡河指挥强渡，与张国焘分裂活动作斗争。对此，邓小平十分钦佩。长征到达陕北后，邓小平疟疾缠身，暂时停在吴起镇与疾病搏斗。刘伯承则奉命仍在做红四方面军的工作，因此没有相见的机会。

邓小平在回顾他和刘伯承的友情时，满怀深情地说：

我们一起工作，是1938年在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个师长，一个政治委员。以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前后共事13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我比他小十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伯承善于与同志团结共事的高尚风格，在今天仍是我们领导干部的表率。

• 第一章 •

危 难 之 际

——时势造英雄。每当历史处在大变动的时期，大叱咤风云的人物就会应运而生，站在汹涌澎湃的历史潮流面前，肩负起力挽狂澜的重任。

一 毛泽东提出“围棋”战策，要在华北敌后用“做眼”的方式，发展自己，吃掉敌方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头的枪炮声，把中国的历史，推入到长达8年之久的全国性的抗日战争中。

对外软弱妥协的蒋介石当权集团，在民族危亡之机，却把手中的枪炮对准国内的人民革命力量。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下，蒋介石竟然发出对各将领的训令：

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先清内匪，则决无以御外侮。

各将领若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意剿匪者，当以贪生怕死者视之。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虽被逼进了内战的旋涡之中，但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大敌当前，只有举起团结抗日的旗帜，拯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际，才能动员起全国民众，推动中国历史的进程向前

迈进。

于是，中国的两大政治、军事力量表现出截然相反的两种政策：

拥有政权、强兵的国民党当权者蒋介石集团竭力频繁发动内战，妄图以抗日为借口，消灭异己，铲除人民革命力量。

得到广大民众支持拥护的中国共产党及其红军极力主张国内各党各派、各种武装力量停止内战，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国内局势，在两种决策下，出现两种趋势：

蒋介石集团不顾国内外强烈的反对声浪，一意孤行，向打不垮、吃不掉的红军一而再、再而三地连连进攻，疯狂镇压，坚决要求停止内战、全力抗日的民众，直闹得天怨人怒，导致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蒋发动兵谏，这就是著名的西安事变；

中共为促进国内团结，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竭尽全力，奔走呼吁。抛弃前仇，力促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蒋介石迫于情势，终于下令停止了长达 10 年的内战。卢沟桥事变，加速了国共合作的步伐。经过国共多次谈判，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实现，决定中国抗日战争命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此后，一场国共联手，动员全民族一切力量，向日本侵略者发动大规模反击的全国抗日战争，在中国大地上呼啸而起。

国民党实行抗战，是被迫发动的。因此，抗战开始后，它并没有提出有效的全面抗战路线，却顽固地坚持一党专政，只实行单纯政府和军队的抗战，拒绝有利于抗战的根本改革，不给人民以抗日所必需的民主自由权利，不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防止人民力量在抗战中发展，反对抗战成为人民大众的抗战。其指导思想，在于要使抗战的进行不致损害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因而只能是片面的抗战。

但形势的急剧变化，不允许停留在片面抗战上，否则，将是国破人亡。历史呼唤全面抗战。只有以全面抗战来动员民众，才

能拯救中华民族。这一责任，自然而然地落在忠实地代表中华民族人民群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身上。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为决定党在历史转折关头的路线、方针、政策，在陕西渭北高原的洛川县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制定全面抗战的决策问题。

会前，邓小平被留在云阳镇红军总部，主持总部工作。在吴起镇养好病后，邓小平随毛泽东、彭德怀带领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出师山西。东征结束回师陕北后，邓小平出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得到政治委员聂荣臻的信任。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对中国工农红军总部进行调整，邓小平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驻到云阳镇后，邓小平随总部到达云阳镇，担任了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彭德怀、总政委任弼时）政治部副主任。

邓小平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积极推进者。他支持周恩来同国民党方面的谈判，并在卢沟桥事变后，参与周恩来同国民党就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谈判。8月上旬，邓小平被中共中央指派，同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一起，到南京参加国民政府召开的国防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国共达成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协议。从南京回云阳后，邓小平全力抓红军改编的工作，未去冯家村参加会议。

刘伯承是8月6日在甘肃省镇原县接到要他和张浩一起赶赴冯家村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电报的。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刘伯承奉命带领新组建的红军援西军，挺进甘肃省，接应徐向前率领的红军西路军。西路军失败后，他和援西军政委张浩、参谋长李达率军停在镇原县待命。8月6日，中央命令他和张浩赴会的电报中，下令援西军撤回到陕西省三原县石桥镇整顿。接电后，刘伯承、张浩、李达率援西军日夜兼程，到达石桥镇。稍事安顿后，又和张浩马不停蹄奔向冯家村。他们赶到会场时，其他参会人员已经到达。

参加冯家村决策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朱德、任弼时、关向应、凯丰、张国焘。红军将领有：彭德怀、刘伯承、贺龙、张浩、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张文彬、肖劲光、林伯渠、徐向前、周建屏、傅钟等。

冯家村决策会议，在充满抗战激情和民主的气氛中进行。张闻天作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主持了会议，并作了较长的发言和报告。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报告。周恩来在报告中介绍了与国民党谈判情况和国民政府政治、经济、国防、外交等方面的情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对抗战的长期性和可能出现的曲折、危险，出师华北的战略部署和群众工作等问题发表了重要意见。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共中央公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鼓动提纲。

毛泽东的报告，是会议讨论的重点。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将是艰苦的持久战。红军当前的基本任务是：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保存与扩大红军，牵制与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争取民族革命战争中的领导权。毛泽东强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红军的活动，只能由我们自己决定。

讨论是在热烈的气氛中进行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抒己见。大多数与会者同意毛泽东的报告精神，拥护中央的政治路线。也有少数人在一些问题上，提出了不同意见。

会上争论的问题，涉及到红军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任务、方针、作战指导原则和部署等重大问题。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总结，回答了讨论中提出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一定要实行党对抗战的领导，依靠人民群众，实行全面抗战，反对片面抗战、反对妥协退让，民族革命战争才能获得彻底胜利。毛泽东指出，我

们已采取“山雀满天飞”的办法，撒出了大批干部，到华北敌后各地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我们的主力到华北，要象下围棋一样做几个“眼”，“眼”要做得活，做得好，以便和敌人长期作战。

毛泽东对红军开赴抗日战场后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他指出，所谓独立自主，就是在整个战略部署下，我军有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执行统一战略意图的灵活机动权；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的自由。所谓山地，不只是就地形而言，而是指首先在山区创建根据地，依托山地开展游击战争，尔后向平原发展。所谓游击战争，是指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通过广泛的游击战争，达到开辟敌后战场，支援正面战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

毛泽东的总结，深刻、通俗、生动，使与会者对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纲领、基本任务和各项政策，特别是红军的战略方针，有了清晰的认识，较好地统一了大家的思想。

8月25日，会议进行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通过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公布八路军总部及各师指挥员名单。新的中央军委由11人组成，毛泽东任书记（实际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任副书记（实际称副主席）。其他委员有：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林彪、贺龙、刘伯承、张浩、徐向前。

在宣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任命时，邓小平列在八路军总部的将领中，出任了八路军总指挥部（不久在9月11日改称“十八集团军”，人们习惯上仍用“八路军”的称呼，直到抗日战争结束）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为任弼时）；刘伯承出任一二九师师长。他们两人在日本帝国主义长驱直入横行于华北、华东之时，受命于危难之际，勇敢地挑起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挽救民族危亡的重任。

毛泽东的“围棋”战策，在洛川冯家村的会上，还没有引起与会者的高度重视。这一高深的战策，指导八路军进入华北敌后